〔动　态〕

清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

晓　栩

清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３月在北京举行。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一次小型专题讨论会。与会学者共30余人。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清代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对于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主要有两种明显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到鸦片战争为止近二百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衰退的过程。持这一观点者尽管在具体时段划分上又各有差异，但一般都认为清代经济在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嘉道时已开始走下坡路。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乾隆直至道光，清代经济仍保持继续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所谓衰退或停滞。对于清初有一“恢复”阶段，以及此后的发展，双方似无异议，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嘉道时期。

如何评价嘉道时期的社会经济是这次会议论争最为激烈的问题。持“衰退”论者认为，尽管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仍有发展，但从整体上看嘉道时期是走下坡路的，乾嘉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以及继之而来的政府财政危机是经济衰退的主要表征。也有同志从人口土地因素着眼，认为人口压力是形成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所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是嘉道年间衰败停滞乃至制约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本质的因素。

持“发展”论者则较多地从地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角度论证。关于地区经济，有同志认为乾隆以后传统农业区仍保持一定的发展，但潜力不大，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向边区、山区扩展，如东北、西北的大规模开发。也有同志认为乾隆～道光年间的发展并不仅限于新开发区，全国大部分地区经济都在其原有的基础上，以各自的特点继续发展，未见哪一个地区呈明显的衰退之势。对江南经济的估计有不同意见，有同志以苏州、南京丝织业为例指出江南经济的衰退；也有同志认为江南丝织业的衰退与丝织品出口转为生丝出口这一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另有同志指出，清代中叶江南棉布市场的缩小是由于华北、两湖等新的棉布输出区的形成所致。而这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缩小正是清代中叶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关于商品经济，不少同志指出清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新的商品经济因素的增长应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乾隆～道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反映在：（１）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及农业商品化趋势的发展；（２）农村市场的大幅度增长，尤以华北、四川等发展中地区最为明显；（３）新的与近代相衔接的流通格局逐渐形成；（４）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扩大。还有同志从生产关系角度指出，清代的租佃制度，小农经济本身也仍在继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租佃关系的多样化，以及佃农、自耕农经济实力的上升，而不是贫困化。

对嘉道时期社会经济的褒贬不一，实际上是由于评价标准的不同。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

几种：（一）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标。清代中国仍是个农业国家，农业可为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多少剩余劳动，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二）综合劳动生产率指标。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是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农民在土地以外投入的劳动占有很大比重，单纯农业生产率不足以反映这一点。（三）商品经济指标。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粮食供给能够得到保障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会使社会总产值增加，而且能够抵消人均产值的下降。（四）生产关系指标。清代生产关系一直是在不断调整中的，这一系列的调整对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它表明封建经济自身还具有活力。（五）国家财政指标。财政收支应是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赤字累累的国家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盛世。（六）综合指标。主张以人口、土地、生产力、财政、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等方面综合考察。

二、清代人口和耕地面积。

对于乾隆六年以后的人口数字，与会同志一般认为由于它已与赋税征收相脱离，虽不尽准确，仍可慎重地使用。至于乾隆以前的丁数只有赋税征收意义，不能作为实际丁额看待。对此，有同志强调联系前后朝代的数字进行估计；也有同志主张可以把乾隆～道光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倒推；还有同志认为，这一问题尚有待于个案研究、地区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于人口压力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乾嘉时期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已被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压力已达到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另一种意见认为，人口压力虽然存在，但尚未达到“临界点”，仍可以自我消化的方式来解决，主要是向边区、山区发展，同时也有从业结构的变化。也有同志提出，人口压力不能一概而论，北方和南方有很大不同，应使用地缘人口的概念。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清代前期尚不存在“人口压力”问题。

此外，有同志指出人口研究应进一步深化，诸如人口结构、家庭规模等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于耕地面积，不少同志指出官书登载的田亩数字虽然是财政亩，但总是有一定依据的。也有同志将全国划分为已开发、开发中、新开发三类不同地区，分地区分阶段考察其耕地面积的增长状况与其所处开发阶段的关系，也得出耕地数字有一定事实依据的结论。对于隐漏与折亩因素的影响，有同志估计为20～30%；也有同志认为地区差异很大，一般说传统的农业区隐漏率较小，新开发区则极为严重。折亩率则北方大大高于南方。在具体计算方法上，有同志主张将隐漏、折亩及政策性失漏等因素分别以一定比例折还；也有人主张以民国年间调查数字回归计算；还有同志强调应首先加强地区性的研究。

三、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地位。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清代社会经济较之宋明均有很大的发展，可说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但在具体评价上则有不同。有同志认为清代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社会总产值的增长是肯定的，人均产值也未必降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各项经济政策也比前代进步。总之清代是封建经济的成熟阶段。也有同志认为，清代社会中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如社会分工的发展，部分商人向近代工商业者的转化及初具近代功能的市场结构的形成等，正是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而未沦为殖民地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考察清代的历史地位必须考虑两个座标，纵向来看，清代较之前代有所发展；横向比较，中国在世

界范围内已经落后，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

提交会议的论文大多围绕以上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专门研究。会议讨论中还提出另外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理论问题：（一）国家的经济职能及其作用方式；（二）如何认识封建财政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及其与近代财政的不同；（三）各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及其相互作用过程；（四）中国特色的近代化道路。讨论还涉及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以及计量史学等方法论问题。